

李凤群 著

颤 抖

一个来自于农村，

在城市生活多年患上了抑郁症的女人的经历

拯救不是来自于他人，是来自于自己，

通过回顾，还原，自省，忏悔，达到对生活以及生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



013068135

I247.57
2851

颤抖
李凤群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颤抖/李凤群著. 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8

ISBN 978-7-5321-4872-1

I . ①颤… II 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9524 号

责任编辑：魏心宏

封面设计：钱 赘

颤抖

李凤群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134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872-1/I · 3813 定价：2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5656262

有的秘密，就像过期的日历，顺手一放便可，即使在风里飘扬，也没人愿意屈尊听闻；有的秘密，要年年加土，防止岁月的灰尘扬起，使它露出一点点端倪。

关于我的秘密，会令一些人失望。

和一凡初次相识于七年前，那时我们各自都已结婚。

那年夏天，他休了一个月长假，带着夫人和孩子去了尼泊尔。回来后，发过来一张他在尼泊尔草原的照片。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张照片。山脉蜿蜒，河流清澈。河岸边的男人年约四十，面色严峻，皮肤略黑，看上去斯文、健康。

这么说吧，七年来保存在我心里的就是这么平常的形象。无须设想，更无幻想；容不得指手画脚，没有挑剔的理由；没有惊奇，也没有失望。没有迹象表明，他将会多么重要，然而，他的确非常重要，对我此后的人生而言。

三年后，我有一个见到他的机会。但是我放弃了。我想是因为害怕。坐在他办公室楼下的出租车里，我突然失去了勇气，明白自己

没有准备好。

又过了四年，事情变得容易些了，我去拜望他，很想和他面对面坐下来聊一聊。不过，有些东西早已消失。不见踪影。

这种结局注定的。现在，我可以写一本书，关于从未曾会面的人们。

那当时的我自己呢？有一张照片是那年回老家时在堤岸上拍的。照片上的女人站在一溜红砖青瓦的农舍前，那种典型的南方农村住宅。逢年过节，堂屋的双开大门上会贴上大红的对联。就在这喜庆的大门边，站着个穿格子呢大衣的女人，这件大衣价格不菲。我每年给自己买一件上好的大衣，为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让别人看出我富有，日子过得富丽堂皇。我们很自觉地扮演荣归的儿女，替父母撑门面。照片上的女人，有张灰暗忧伤的脸，眼睛里有一股提不起精神的萎靡之气，毫无生趣可言。她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腰没有挺直，大衣的前摆往上翘起，照片的边角露出邻居小孩子半张调皮的脸。时隔七年，耳边犹有恭维之声，不停地夸扬她的大衣和富贵。这正是她的愿望和目的。精心打扮，满目期待，就是冲着这些话来的。这些善解人意的乡亲们，明白出门在外的孩子们的用心，不忍心对她眼巴巴的期待视若无睹。他们体恤她，不让她失望。他们装着看不出她神情恍惚，看不出那飘忽在空中、无处落定的眼神。今天，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我又起身翻出这张照片。我看清了那个可怜的形象：挂着无助和茫然的冻僵的笑，像不知道从哪里来又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孤魂野鬼。

那年，抑郁症状已经很明显了。每天早上睁开眼，一接触到光，绝望之感随后就到，劈头盖脸将我笼罩。天地一片黯淡。房屋、树

木、衣服、家具，所有的色彩混淆在一起。有时我会静静地等着，带着尖锐的焦灼观望这一景观并等待它结束；或者就在这变幻的过程中满腹怒气，逮到身边哪个人一件小事没处理好，就会喋喋不休地指责，思绪像锅粥似的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凡作为我的责任编辑，打来电话，就封面版式的设计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答非所问，不知所云。

怎么了，他问，你怎么了？

没什么。我恍恍惚惚，你随便怎么处理都行，不要问我。

啊？他顿在那里，不知道是挂了电话还是等着为好。就那么一瞬间，他错过了。往日的局面即告终结。

愈加压抑的沉默。这沉默渐渐演变成抽泣。我好不容易压制之后，勉强能说出，我挂了。

他说，啊，不，不。怎么回事你说吧，说吧。这声音非常温柔。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一个男人如此洁净的温柔。这温柔具有神奇的安宁作用，我的情绪慢慢平静。我跟他说：

我受不了这热烈的太阳。

他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试探着问：

在房子里还受不了？

是的。是的。我的声音急躁起来了。

还有呢？

我受不了楼下的麻将声。我母亲，和邻居们在楼下客厅打麻将。

你母亲，她知道你今天不舒服吗？

是的，她知道。她知道我每天都不舒服。

你可以请她不要打，或者到外头去打。他的嗓音突然提高，变得果断而坚决。

马上就说，现在就去说。

仿佛他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一个同盟、一个战友。某种东西朝

我袭来，满含着无法表达、难以忍受的温情。

在潜藏的委屈里头，也潜藏着自责，潜藏着对委屈暴露在外的不安。一个跟我的生活完全无关的人，他站在旁处，表明他的态度。事情发生了变化。他在不知不觉中被置换了身份。“信”从此开始。现在，我深表怀疑之事依然很多，不，较之往日有增无减，但是这一瞬间，“信”如同一个物体落地，掷地有声，令人为之震动。

关于抑郁，我当时未曾认真思考。其实我的家族早在三十年前就出现过自杀的先例。我伯伯在婚姻发生变故后，选择上吊自杀。我家老宅的厨房屋檐低矮，大人一进去头就能顶到屋顶。他把自己吊在屋檐上之后，双膝弯曲，抵住水缸。死后他的头深深地垂在胸口，脖子拉得老长。那样的死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我没有见过他，他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，但是那求死的决心和意志使我敬佩和心酸。而我的爷爷，在儿孙满堂、衣食无忧之后，也选择服毒自尽。我的父亲，如今一想到那张愁苦的脸，我就清楚，他一定也是抑郁症患者。在我们那个地方，没人知道什么叫抑郁症。我们的世界只有两种人：正常人或者疯子。这么说吧，我伯父死之前，已经有一年不会笑且睡不着觉了，即使他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明白他需要治疗。对生活的无望也是疾病的一种，唯有死才能将其医治或者中止。我们这个家族是腼腆羞涩的，从来不正面谈论自己身上这些不怎么体面的话题，更不会表白什么爱与体贴。逢年过节我们不祝福，不给老人敬酒，不交流内心的东西。欢欣、爱、满足，这些我们也不说，小孩子如果要泄露就随他泄露，大人不必理会。新鲜的东西我们不习惯。我们向来沉默。

就像此刻，我拒斥着母亲快乐的干扰，但我不声张，不会跟她说，请你小声点，你这样使我难受。我不暴露，没法开口。

我跟一凡提到不能容忍太阳的时候，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已近三

年。我第一次从乡下到城里，是十八岁。而我母亲要晚得多，她快六十岁了才来到这里。跟我不同，她有落脚点，住现成的房子。而这些，是我用十年的青春和血汗为她开辟的。母亲适应得很快，她帮我料理家务，做饭、拖地。她身体好，家务做得快，到了下午，她会约一帮阿姨回家打麻将。每年年底，我会给她一大笔钱，数字远超其他子女。因为照料我的缘故才如此丰厚。事实如此，但不点破。

关于母亲，我在另外一部小说里写过。我写她怒气冲冲的模样，骂声直冲云霄，把她暴躁的一面兜了个底朝天。但是那不全面，是带着情绪、带着恨写的。乡下的母亲们都这么干。她们的巴掌从来不吝啬挥向女儿的脸颊。那脸颊不珍贵，没什么忌讳。我许多童年好友的脸也被扇过许多次。有时候事先被警告，有时候突然而至。被扇过的姑娘们躲到没有人的角落，抽泣一小会儿。我们抽泣的时候能听到外头的小孩子在捉迷藏。那快乐的、肆无忌惮的笑声，屋里屋外，恍若两重天。不过，因为惦记着分派给自己的任务，姑娘们会擦擦脸上的眼泪，把刘海往下压一压，尽量遮住红肿的眼泡，从角落里走出来，走回家务中来。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被扇耳光的羞耻和愤怒，我们明白轻重不一的耳光带来的感受是一样的。但从来不说，眼神交流也不敢，那样只会使羞耻感扩大和外化，我们让它尽快过去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

不过，掺杂了谎言的气球最终会爆破。在一本书里，我母亲不再是被我定性为罪恶和不负责任之人。她在书里脱离了我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，甚至被某位阅读者特意著文分析过，笔调充满同情和怜悯。今天，既然要写一本诚实的书，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：我母亲，即使她有理由被恨，同样也有理由被爱和被尊重，现在，我对此了然于心。

再次通电话是一个月之后。一凡小心翼翼地问我好点没有？他的记忆停留在我不安稳的情绪当中。

在此期间，我去了两家医院。两位专家的诊断结论一致，给出的治疗方法也差不离儿。但是我有抵触，我不接受使用抗抑郁的药物麻痹神经，更不屑所谓心理疏导——面对职业性的面孔一层层剥开我的皮肉，任由他们切割。我有极强的防备心理。治疗无果。

简单点说吧，快乐和幸福被抽离，它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不见。向往和幻想枯竭了，丧失殆尽，厌世之感与日俱增。每每揽镜自顾，我都不能掩饰对自己的恶感。平庸的脸、肿胀的眼睛、粗硕的躯干，我对这副样子产生深深的失望。就这模样还有资格得到爱，看到阳光开怀大笑？还不如早点死掉。

这种念头一经产生，如同江水漫出堤坝，一再冲撞，不休不止，时时刻刻在我脑子里盘旋。这是隐秘的呼唤，从遥远的心底发出的呼喊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每天晚上我睁着眼睛迎接黎明，到了白天则浑身乏力，怏怏地、寂然无声地缩在床上，四肢沉重。远方的世界、市中心的钟声、元宵节的花灯、厨房里的香味，一切都使我厌倦。似乎只有绝对寂静无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去处，唯一的目的地。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落，抓不住依托。每每孤独的气息填满整个房间的时候，悲伤开始登场。它像一团黑色的圆雾状东西，从脚后跟进入到脚心，毫无羁绊，慢腾腾往上游走，我静静地感受着它，直到它来到胸膛，然后到达喉咙。我有一种强烈的号叫的愿望。号叫，既是帮助悲伤达到顶点，也是对悲伤的抵抗。再过一会儿，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的号啕。胸腔里郁结的所有东西都随着这一声久长的号啕向外消散而去，我从中获得某种短暂的满足感。为什么许多抑郁症患者愿意选择从高处跳下去，我想那样一来，伴随着毁灭的一定还有生命的启示。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如此奇妙，让生命染上了死亡的色泽，

使阳光如此不能容忍，使生显得如此悲壮。那段日子，站在五楼的阳台上，飞身跃下的冲动一再撞向我的胸口。那个行动没有实施，我为继续逗留尘世感到难堪。我认定这是生命最合理的终点——跃而起，奋勇而下。

这是迟早的事，自然到来。我在等待。

一凡再次打来电话。一切为之改变。

七年后，为着这种相遇，我有写一本书的想法。在此前完成的一本书里，我写的是故乡。有个人读后告诉我说：你对家乡，对过去，一直没能原谅。他提醒我，一个不原谅的人是不会幸福的。

这是个令人奇怪的发现，我不知道自己没有原谅什么。我不认为恨过去对我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，我不想把过去带进未来，从我十八岁跳上甲板的时候起就把人生一分为二了。可那位老练的读者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一本书就是你灵魂的一个窗口，它关不住你想藏匿起来的秘密。

现在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原谅。我想写一本对生活有全新认知的书，关于宁静和勇气。我将不用华丽的辞藻来干扰他人的感受，一本书诚实与否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；所以，我不玩花样。

十八岁，我坐船从乡下来到城市。我出来的时候，“不信任一切”这个特质就随身携带了。从那艘渡船开始，我就拖着这尊“不信任一切”的躯体独自闯荡。我肯定有刻意想讨人喜欢的时候，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。但是，在我的内里，藏着某种坚硬冰凉、似是而非的东西。

这个东西在此后数年像石头一样横亘在那里，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态度。我不相信当官的不受贿，不相信有不短斤少两的小贩。仅有这些还很好说，我甚至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需要防备的同类。牺牲是不可能存在的，奉献是空匣子。

任何敏感的人一经发现我的这个特质，必然远离我，只有极少数胸怀宽阔的人才会迎难而上，帮我发现和改造。改造是个剧烈的词，难度很大，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城市，谁愿意找这个麻烦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。此前我不知道这个特质是随我出门的，以及背负的许多东西，比如怯懦、比如伤感、比如不安。我那时还不知道那些东西会现身，会跟随我一生一世，会干扰到我的生活。不过我相信自己有可能前程似锦，对此我倒是经常想入非非。

我后来形容第一次离开家时，总会提到那只装着一堆棉絮的蛇皮袋。我称自己衣裳寒碜、两手空空、身无分文。我从小学到十七八岁，一直都是扎着两根麻花辫子，我上火车之前悄悄地把牛皮筋解开了，但麻花形还在，我悄悄地用手在发梢使劲，以期头发稍稍直一点，让自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，有一头可以飘起来的直直的长发。

那天，在那条船上，还有一个女孩，到城里投奔已经立足的表姐。这女孩，是离我家不足十里路的八卦洲人。她是第一次离开那个小岛。她拘谨、胆怯，闯荡世界的愿望和对陌生空间的畏惧使她惶惑而无助。她从我的衣着上嗅出我跟她一样。她找我搭讪。很快我们找到共同点：我们将去同一个城市，同一个未来。她看到我解开了辫子，也悄悄解开自己的。这个做法使我俩的距离瞬间拉近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为彼此的勇气和满满当当的渴望而心领神会。我记得她的模样。她笑的时候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给人很舒心的亲切感。尤其是那

样初次离家的日子，这种亲切和默契，格外让人踏实。

这个女孩，两年后我在街上一家发廊门口碰到过。她身处的发廊紧靠一个当时很吃香的国营炼钢厂。炼钢厂的院墙里伫立着许多棵有年头的老树，老树上伏着许多麻雀。炼钢厂旁边就是6路公共汽车总站，只要公共汽车一进站，群雀会飞身而起，在空中乱中一团，车停过后，它们才谨慎有序地飞回来。这个女孩就倚靠在贴着彩色美女招贴画的玻璃门前，正和另一位跟她差不多装扮的女孩子闲聊。我凭着她的笑声认出了她。她的头发已经烫成了波浪形，我们认识那天她穿的那件高领线衫不见了。潮湿的初春，她领口敞开，露出乳沟，那原本不能见天日的东西鼓动在阳光下。她的手指，涂抹上了血红的指甲油，正无所事事地绕着一缕头发玩。除了她的笑，她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从八卦洲带来的了。她的身体离她的笑容越来越远，变得跟她完全无关似的。我感觉心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，脸红到了耳根。我慌忙躲到公共汽车庞大的车身后，凭借车身的掩护绕开了她的视线，一直没有回头。虽然我们趴在甲板的栏杆上，彼此庆幸能遇着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到了城里，要保持联系，我们是老乡，要相互照应。

一凡打这个电话前，有一天，我在卧室的阳台上晒太阳。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在对面的阳台上举着DV拍摄我。我当时没有在意，孩子嘛。他们什么都好奇。紧接着第二天，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遇到他。他仍然举着那个玩意儿。一个崭新的迷你型DV，一定是他的生日礼物什么的，正在拍一只猫，一只胆怯的四处张望的白猫，身边没有主人。他认出了我，他对我说，阿姨，我不会把你放到网上去的，我有道德感。

他的镜头的确像捕捉小猫那样捕捉过我。

我迅速回忆了一番，认定自己没有在阳台上有过什么不雅出格的言行。

我得说，那是我第一次在真实世界里从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。镜头里的女人穿着一套过了时的宽松的碎花睡衣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胖，至少骨架很大，不过，阳台上的这个女人，无论她的胸还是腿都单薄得要命。发呆的女人，头发零乱，双臂像芦柴叶子一样搭在椅背上，病态是显而易见的。她身边放着一摞零乱的报纸杂志，她坐着，根本看不出身份和性情。就算和她朝夕相处，也摸不透她在想什么。镜头一开始远远的，后来在慢慢拉近，似乎很想窥视到更多的内容。不过，那发呆的姿态和面孔始终没有变化。女人边上的玻璃茶几上，是一只空空的玻璃杯子。几分钟之后，镜头有点失去耐心。这个女人浑然不觉，在微微晃动的镜头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无所适从的坐姿，表情也毫无变化。这单调的镜头一直持续了五分钟左右，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：

我这一直这么坐着吗？这么坐着有什么好拍的呢？

你坐得实在太久啦。老年人一样。

下一个镜头里的女人，仍然久坐不动。镜头里静止一分钟比现实里静止一个小时还让人难以忍受，此时镜头也不耐烦地左右摇晃起来。两分钟之后，镜头微微缩了一些。我母亲从楼下的阳台上出现，她跟楼下经过的邻居阿姨打招呼。我也是第一次从镜头里看母亲。镜头里的母亲笑容满面，她肥胖、壮实，面色绯红，笑意盎然。她手上拿着抹布，抹着阳台栏杆上的灰尘。她在跟自己说话：不晓得怎么有这么脏，昨天才擦过。她说：跟人家学，把阳台封起来就好了。这些话，DV里听得清清楚楚。这时镜头突然一动。来到了楼上卧室的阳台。本来发呆的女人突然双臂抱在一起，紧跟着脖子缩了起来，怕冷似的，身体勾了下来。楼下母亲的声音继续响起，阳台上的

女人双手捂住耳朵，身体窝成一团之后，仍瑟瑟发抖。不一会儿，她扯下椅背上的一条浴巾，蒙住了脑袋。此时镜头里的女人已经变了形，浴巾掩盖的女人缩成一只球似的匍匐在那里。一直到楼下的母亲擦完玻璃从阳台上离去，她才慢慢恢复过来，坐回到椅子上。此时，那张面孔更加木讷、机械、无精打采。

看到这里，孩子指着镜头告诉我：你怕你婆婆，非常非常害怕她。他的声调充满了同情。很显然，他没搞清关系。再往前，还有一段。我母亲在楼下喊我开门，她的手上拎着大小许多塑料袋。她出门买菜，忘记带钥匙。而我就坐在阳台上，对于她的呼喊却置若罔闻，不是置若罔闻，而是竭力抵抗。我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就把身体往里让了让，生怕她看到我在。镜头里看得见楼下栽种的好几株榆树和广玉兰，枝繁叶茂，母亲一走动，身影就被树影遮盖。远处有悠闲的老年人牵着他们的狗一阵急一阵缓地来回走动。母亲的呼喊继续响起，为了躲避这个声音，阳台上的女人干脆双手捂住耳朵。直到母亲失望而疑惑地停止呼喊，无奈地一屁股坐到台阶上，这个女人才磨磨蹭蹭地离开阳台，不情不愿地到楼下替母亲开门。母女消失很久，拍摄才罢休。

你像一根要断的绳子。这孩子说出了一句话，他为自己的发现和总结简直得意洋洋。

拍这个 DV 的高中生不久之后便去了加拿大留学。他离开后，我舒了一口气，我很高兴他不再在我眼前晃悠，也不再在暗处窥视我的生活。但我坐到阳台上的时候会习惯性警惕地东张西望，在遇到对面有人的时候会拿着一本书装装样子，尽量留意不被更多的人发现。生活被窥探，比想象中更加令人生畏。

通这个电话时，我对一凡仍一无所知。这个男人，除了发过一张

在尼泊尔的照片，没有向我敞开他自己任何方面的愿望和兴趣。我们交谈的内容始终是作品：版式、版税、宣传、定价。而我，也不知道将来有一天，我会向他敞开得那么彻底。我是一个羞于向人敞开心扉的女人，直到我感受到了温柔。

“温柔”也是一个极容易产生歧义的词。不过，有一种温柔是中性的，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，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一部分。

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就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个疑问。关于你母亲、关于你对阳光的恐惧、关于那种不安。现在我明白，他，一定就在我的哽咽中发现了什么，发现了他认为不能够回避的事情。

说来话长。

没关系。我听着呢。他显得耐心足够。

从什么地方说起呢？

那是我老家的房子。起先，我坐在堂屋里看书，在里屋一个罩着蚊帐的昏暗的床上，我奶奶，这位肠子已经差不多全部烂掉的老太太气若游丝地呼喊着我：

二子，给我倒碗水。

我奶奶正在死去，即将死去。我们都在等她的死讯。关于即将到来的死，我们满怀期待，静静等候。她被从医院抬回来之后的两个多月里，每天早上，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她的房门口看一看她死了没有。每次我们都能发现她的眼皮能动，或者，她胸口的被子在轻微的起伏。一旦确定她还没有死，我们会争先恐后地向母亲汇报：

还没死。尽最大可能表现得很遗憾。

那是我母亲最为不快的时刻，这个情况她是料到的，但经儿女确认，她的眼里仍然闪出一丝失望：

老不死的。

我感到惶惶。我一直为母亲的威望和权力所倾倒。我母亲经常会抱怨她在这个家庭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三番五次回娘家哭诉。不过，她正是用她那委屈的模样建立了她的地位和气场。现在我明白，她粗悍的理论，其实只对她的家人有效。对命运、对未来，她所知甚少，却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。只要她委屈或者她愤怒，我的心就会如刀割般难受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人敢露出笑脸。有一次，她中暑躺在床上，哼哼着说自己快要死去，兄妹们都明白这不过是身体有恙之人的牢骚。而我，一刹那便相信了她的话，感到末日来临。巨大的恐惧裹挟着我，我躲到屋后的厕所边上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念念有词地向上苍祈求：

让我妈妈活着，让我死掉，让我妈妈活着，让我死掉吧。

然后，我用额头磕碰地面，一下一下，用足全力，以期获得菩萨的注意。注意到此的是我的小脚奶奶，她晃晃悠悠地走来，满怀慈爱地俯身告诉我：

放心，她死不掉的。

现在，我信任奶奶那慈爱的目光和笃定的神色。而当时，我恼恨她，对于死这么巨大的威胁如此不当回事，我母亲刚刚还哭诉着说：

没人帮我喊医生，都巴不得我死呢！

我当时是多么相信她的话啊，相信她的眼泪，相信她认定的结论和评判。对奶奶拉我的手，我不耐烦地推了一下，表达愤慨。

我奶奶去世前的那天下午，我坐在堂屋里看书。我听到了奶奶的呼喊，我没有动。我被某本书里的某段情节迷住了，不，这只是我二十年后在描述这件事时的说辞，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动。我以为她会停下来，可是她仍旧在喊：

二子，给我倒碗水。

如果说,第一次我没有动,没有任何意图的话,这一次,我开始有意识地装聋作哑。当她第三次的呼喊响起时,我干脆挪到了屋檐下。在我以为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会老实下来时,她的声音还是钻进了我的耳膜:

二子,给我倒碗水喝啊!

那已经不是呼喊了,那简直就是哀求。这一次,我逃到了邻居家门口,但是,我奶奶,那固执的哀求的声音仍旧一遍遍地传来:

二子啊,给我倒碗水喝吧!

为了逃避这纠缠不休的声音,我站起身来,下了堤坝,走向芦柴地。三月的芦柴刚刚淹没到大腿,只要踩倒一根,就会发出清脆的咔咔声,我在密密麻麻的芦柴缝里左冲右突,远处要下山的太阳的光芒,把江面染得血红一片。大人们都下地去了,除了偶尔几声狗叫外,堤坝上下都空荡荡的,天地间悄无声息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许多记忆都已丧失。但是那个下午,我站在芦柴地里,在随风摇摆的芦柴苗的上方,隔着高高的堤岸,我清晰地看到在那间昏暗的小房子里,墙壁上铺满了青苔的砖墙屋里,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,正等着一碗开水。等待无休无止,徒劳无益。

那天。在堤岸上,有个挑土的男人看着我一步步往外逃跑。这个男人年约四十岁左右,或许更年轻些。他身板结实,眼角皱纹多,眼睛里满含笑意。这是个没有来历的人。我们喊他:侉子。有一天,他昏倒在沙滩上,被好心的人施舍了一碗稀饭后醒来。为了不让他冻死,有人抱来一捆稻草。后来,这捆稻草成了他的家。稻草上后来搭了棚子,棚子里渐渐有了些衣物,虽然破烂,但有了暖意。他渐渐康复之后,开始帮人挑土打地基。长江越涨越高,我们的堤坝总是嫌矮。每个冬天,大人们不得不顶着寒风,把江边的土挑到堤岸上,加